

万有文库

马克思主义 与自由

杜娜叶夫斯卡娅 著 傅小平 译

辽宁教育出版社

新世纪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

杜娜叶夫斯卡娅 著 傅小平 译

新世纪万有文库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美)杜娜叶夫斯卡娅著;傅小平译.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2

(新世纪万有文库·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5290-8

I. 马… II. ①杜… ②傅… III. 马克思著作研究-人道主义
IV. A811.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7060 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杨 力 马 芳 刘国玉 王之江 柳青松 赵中男 袁启江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赵中男 王之江
美术编辑	谭成荫
封面设计	林 林
责任校对	刘 琛
出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北一马路 108 号)
发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次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49 千字 插页 1
印数	1—6 300 册
定价	11.40 元

应该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王若水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是本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解体这件事是完全没有料到的，它给了我们巨大的冲击。为什么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在短短的期间崩溃呢？这件事对我们有什么教训呢？

对于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件，我们的传媒的反映是颇为平静的，既没有进行详细的报道，也没有展开热烈的讨论。不过，报刊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种观点是：苏联领导人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终于使社会主义遭到失败。

这种观点并不新鲜。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我们就是这样批评赫鲁晓夫的。但实践是如何检验这种观点的呢？我们不应该忘记，当年正是在“反修”的口号下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遭受了十年浩劫。那个时期的“革命的”中国，比起“修正主义的”苏联来，究竟是好一些呢，还是不如呢？

坏事成了好事的转机。正是“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教训了我们，使我们的思想解放了：不能照老路走下去，必须改弦更张，于是才有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路线，才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年我们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的东西，正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而且在经济上走得更远。现在国内还有人攻击今天的改革开放路线。可是，难道不是走了这条路，我们的日子比俄国好得多了吗？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坚持当年对苏共的批评是正确的了。于是，我

们又回到了这个老问题：应该从苏联的演变汲取什么样的教训？

苏联的问题不是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的，早在斯大林时期就暴露出来了。五十年代斯大林的问题揭露后，这种批评达到了高潮。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和政治家一般用这个例子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布热津斯基在1988年写成的《大失败》一书，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他在书中已经预见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体系的解体。不过也还有另一种批判，认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错，只是苏共的领导背叛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是属于后一种的。

从某些方面看，作者的观点和六十年代我们的观点似乎很相近：两者都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两者都指责苏联实行了资本主义。不过稍稍注意一下就会看出两者的不同要大得多。六十年代我们采取的是俄国版的或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我称这种观点是“正统的”，因为它是占主流地位的，具有权威性的。当时我们只是把批判的矛头对准赫鲁晓夫。本书作者却是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新的诠释；从这种立场出发，她不仅批评赫鲁晓夫，更严厉地批评了斯大林等人。

正如杜娜叶夫斯卡娅自己承认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蜕变，是促使她写作本书的重要契机。“我们问自己：历史上第一个工人国家如何转化到自己的对立面？工人的自由是可能的吗？”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作者从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寻找到了新的思想资源，并在这个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认识。在美国，她是最早注意到这部手稿的价值的学者之一，也是最早把《手稿》介绍给美国读者的人。本书在1958年出版时，书后的附录就是作者翻译的《手稿》。

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表述他的哲学观点是“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此处“人道主义”的德文是 Humanismus。在中文里，“人道主义”一词的伦理道德意味太重，用在这里和马克思的原意不合，容易产生误解。显然，马克思是指一种世界观。我主张译为“唯人

主义”。)尽管马克思后来放弃了这个术语,杜娜叶夫斯卡娅仍然采用了它;有时她也称之为“新人道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杜娜叶夫斯卡娅指出,从一开始,马克思的哲学就是和他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分不开的。对劳动异化的分析,构成《手稿》的中心部分。这里的“异化”,既是哲学概念,又是经济学概念。作者不同意那种关于“异化”只是青年马克思一度使用的黑格尔术语,到成熟时期就抛弃了的观点。她强调指出,在黑格尔的“否定性辩证法”中,异化是一个基本概念,它为马克思所继承和改造,不仅在早期著作中如此,即使在《资本论》中也是如此。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异化概念恰恰是一个中枢。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人与人的交换关系是以物的关系的外貌出现的,这种假象掩盖了它的本质。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分析。她还指出:人道主义像一条红线贯穿《资本论》全书;这种人道主义既给了这部著作以深刻性,又给了它力量和方向。

这样一种新的解释,就把马克思的哲学和他的新社会的基本原则有机地联系起来了,这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正如作者所说,“人类自由是马克思为之奋斗的原则,而马克思的哲学的最恰当的名称是新人道主义”。

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只要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方面,那么就可以把他的“绝对”和马克思的未来社会联系起来,因为两者都意味着达到了完全的自由。

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这句名言:“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是应该知道,社会关系也会异化,而成为与个人对立、凌驾在个人之上的东西。诚然,个人不能脱离社会,脱离了社会的个人是抽象的个人;但同样真实的是,社会也不能脱离个人,脱离了个人的社会是抽象的社会。杜娜叶夫斯卡娅引证马克思说:“我们应当特别避免建立一个与个人对立的作为抽象的社会。”

这样,关键的问题在于克服异化。杜娜叶夫斯卡娅认为,那种把私

有财产等同于资本主义，国有财产等同于社会主义的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就是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坚定不移地认为，使‘社会’成为所有者而保留异化劳动不变，是在创造‘抽象的资本家’。”只有“自由地联合起来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社会’变成了社会化生产资料的主人时，废除私有财产才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宁愿用“新人道主义”而不用别的名称的原因；同时，这也是作者称苏联实行的制度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理由。

杜娜叶夫斯卡娅用了三年时间以第一手材料研究了苏联的三个五年计划，从而得出苏联实行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结论。这里的“国家资本主义”，当然不是列宁设想的那一种。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名称，不能不承认本书的第十三章《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与工人起义》是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虽然作者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她仍是公正的，并没有否定一切。她说：“俄国的工业增长率无疑是非常高的，但是俄国人宣布的数字却很值得怀疑。”“对那些虚夸的成就我们可以不去理会，但不能否认国家确实实现了高速的现代化。”

在阅读本书的时候，读者也不应当忘记，本书写成于1957年。四十年来，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作为崩溃的结果，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都纷纷抛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显然不是作者预料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应当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些国家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马克思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的水平呢？中国共产党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才认识到，我们还需要补市场经济的课，我们还只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经验是值得重视的。

作者对列宁主义并没有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尽管她对列宁很尊重。在对待列宁的哲学遗产问题上，她一反当时苏联的潮流，贬低《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推崇《哲学笔记》。在革命的问题上，作者看到了“先锋队政党”的异化，转而寄希望于普通的工人群众。这个观点

无疑是非列宁主义的,而更接近于马克思。但是,那种把全人类的希望寄托于一个特殊的阶级的信念,是否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呢?书中那种对工人群众的革命作用的无保留的肯定和赞美,是否又潜伏着异化的契机呢?当然,除了工人群众外,作者也看到了黑人、妇女和青年的革命作用,这是对的。但是,经历了科技革命和进入信息时代的我们,会很容易地看出,作者没有对知识分子的进步作用和自动化的革命意义给予足够的估计。由于作者过分强调黑格尔的“绝对”,所以他认为,今天的危机是总体性的,它要求总体的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都变成全球性的问题了,因而需要国际性的合作;但与此同时,我们更倾向于一种多元的世界观,并不认为存在着总体解决的方案。

本书作者杜娜叶夫斯卡娅生于1910年。1937年,当托洛茨基流亡到墨西哥时,她曾担任过他的俄文秘书;两年后与托洛茨基决裂。这本书是她的“革命三书”的第一部;其他两部是《哲学与革命:从黑格尔到萨特和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罗莎·卢森堡,妇女解放和马克思的革命哲学》。我初次知道作者的名字,是多年以前的事。那时,我看到了E.弗洛姆主编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一书,就收进了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文章。1993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到美国,遇到了《新闻与通信》(杜娜叶夫斯卡娅创办的报纸)的负责人胡迪斯(Peter Hudis)。他告诉我,杜娜叶夫斯卡娅生前曾表示过想见我的愿望,可惜她在1987年就去世了。为此,我也感到很遗憾。1994年,我曾到芝加哥拜访《新闻与通信》社并参观杜娜叶夫斯卡娅的故居。我看到,《新闻与通信》的同人仍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和宣传她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包括编辑和出版她的遗著。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已有多种文字的版本;现在,她的著作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我想,这也可以算是对作者逝世十周年的纪念吧。

哈瑞·麦山写的序言

应邀为本书英国版作序，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荣幸。但动笔之前一直有所迟疑，因为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有资格，向英国读者介绍这样一部学术著作。

那些竭力冒充马克思智慧宝库**权威**看守者的人，写下了无数陈腐古板的文字，读来让人厌倦。《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则令人耳目一新。所有矢志为自由和人道的社会而斗争的人，都可以从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中获得教益。

马克思的理论在英国从来没有什么立足之地。摩根·菲利浦先生说过，马克思主义对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影响，还不如基督教卫理公会的影响大，这话并非全无道理。在大宪章运动失败之后，统治阶级在财政上支持宗教福音传道活动，虽然没能阻止工人阶级战斗精神的觉醒，但确实起到了一些延缓作用。大多数工人领袖都抱有某种宗教观点，倾向于温和的而不是战斗的政策。后来，劳工运动甚至带有准宗教的性质。

英国工人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热忱，对马克思主义者是一种鼓舞。但是，尽管他们作出了可歌可泣的努力，却没能阻止机会主义的蔓延。现在，机会主义已经成了英国劳工政治的充分发展了的特征。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显得无能为力，原因很简单：马克思的著作从未像哈德曼、巴克斯和考茨基的著作那样受到充分的注意。在思想方面，英国工人运动落后于其他国家。

俄国革命曾激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兴趣。进行严肃思考的工

人，抓住了列宁的著作，发现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各种社会主义组织出版物中多得多。来自俄国的鼓舞产生了一个令人欣慰的效果：当英国对苏维埃俄国发动战争时，英国工人采取了反对本国政府的立场。

然而不幸的是，俄国内部的力量摧毁了英国及其盟国未能摧毁的东西。俄国工人变成了臣属阶级。英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炮制了大量的文献，搬弄马克思主义词句，为这种奴役俄国工人阶级的行为辩护。

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变得十分必要。这也正是本书的基本内容。正如作者所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解放理论，否则它就什么也不是”。她以深刻的思考结合深入的研究，证明了她论断的正确性。

俄国统治集团的拥护者们，努力劝说英国工人接受这个统治集团。他们以一种广为流传的信念来支持他们的说词：国家占有资本就可以保障自由。英国在制造这一错误概念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费边派的大力鼓吹下，英国工人运动中的大多数派别都接受了这一概念。韦伯夫妇访俄归来后评论说，他们在俄国看到的是实践中的费边主义。正如本书作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东西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资本转移到国家手中，使工人与资本的关系变得与英国和美国一样。在俄国，资本也在通过劳动不断地更新和扩大，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完全一样。由于自上而下驱动的集约化生产，资本用于生产资料的部分在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部分在减少。加速和进一步的加速，变成了一种规则。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一个劳动只为满足现有价值自我扩张的需要而存在，而不是相反，物质财富为满足劳动者发展的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中”，事情只能是如此。

书中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那几章，读来简直是一种享受。那些对《资本论》退避三舍，抱怨它“太沉闷”的聪明人，应该读一读《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或许能激发起他们阅读《资本论》的兴趣。马克思之所以花费巨大的精力去分析商品、劳动的两重性、资本的构成、资本积累以

及危机等等,是因为他怀抱着一一种热切的愿望,就是要看到资本主义暴政的灭亡。

资本转到了国家手里,但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过时。同样的规律还在继续起作用。工人的状况其实是在恶化,因为他们的每一个反抗行动都要直接与国家机器发生冲突。由于国家控制着新闻机构,与起义有关的一切事实,都向外部世界掩盖起来。国家的法律机器保障着自上而下的计划得以贯彻执行。马克思早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之前就已经预先作出了控诉。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所写的一切,都适用于在俄国实行的制度,就像它们适用于英国一样。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以来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无损于他从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皓首穷经的研究中得出的结论。看看英国资产阶级应付当前危机的任何一个行动,都令人感到马克思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直接针对工厂工人战斗精神的粗暴法规,反映了统治集团决心要遏制工人改善自身劳动条件的斗争。他们要求工人进行更多的生产。尽管1919年以来已经三次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间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还长。统治阶级需要更高的生产率,以便获得更多的利润。英国财政大臣抱怨说,“公司的利润率已经从1964年的14.5%下降到了1970年的10%”。

英国劳工运动从人数上讲是强大的,但从重要的理论领域来说,却十分虚弱。英国工人反抗资本主义强制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也是无出其右的。但是,英国控制着一个庞大帝国的历史事实,延缓了英国工人阶级政治思想的发展。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英国工人始终是支持自由党的。虽然,工党后来取代自由党而成为保守党的对立面,但对社会根本问题漠不关心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

工联的上层领袖与议会中的工党领袖可谓一丘之貉。对于他们来说,工联所由产生的那些斗争是毫无意义的。即使在工人反抗资本主义条件的斗争日益高涨时,也看不到不经工联批准的罢工。他们认为,没有工联领袖的指导是不可能的。从这一点来看,且不说其他的内容,

单是作者对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期间工人阶级自我运动的观点，就已经使这本书值得一读了。

马克思曾经写道：“新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是人性的社会或社会的人性”。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福祉依赖于被压迫的工人。工人阶级要打破自己身上的枷锁，并同时为人类带来无可估量的福祉。昨天的赫鲁晓夫也好，今天的勃列日涅夫也好，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的侏儒，他们在党的大会上信口雌黄，自诩在进行什么非斯大林化。在卓然而立的马克思面前，这些侏儒们便显得猥琐不堪。

世世代代，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的必要性，在工人的头脑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但是，很少有哪个工人从未反抗过资本主义的劳动条件。从工人的下层，从那些在不由自己控制的生产资料上劳动，并受这些生产资料主宰的工人中间，早已传出了催促行动的呼声。工人作为人是有感情、有欲望、有激情的，但这些感情、欲望和激情被现存的条件所压制。这就导致了思考、行动和进一步的思考。这就是当今世界统治者们的心腹之患。

本书的作者看到了人类向往自由的激情。正因为如此，她为这本书选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标题。与那些杜撰社会主义哲学的雇佣文人不同，她把马克思与黑格尔更紧密地联系起来，而自由就是这种联系的纽带。与黑格尔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的心目中，自由的实现与新社会的诞生相伴随，并且是通过工人阶级自我活动实现的。工人阶级必须靠自己的劳动来创造使自己摆脱奴役的条件，然后才有可能带领整个人类走向自由。感谢黑格尔、马克思和无产阶级，使我们可以设想人最终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尽管人们对马克思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的活动耳熟能详，从大宪章运动，到国际工人联合会等等，但是至今仍有一种错误概念广泛流行，即马克思所称赞过的唯一的英国机构是大英博物馆，也就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地方。事实上，马克思在流亡英国之前，就真诚地把平等派描写为现代无产阶级及其哲学观念的先驱。他在《道德的批判与批

判的道德》中写道：“一旦君主制被推翻，我们就会发现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第一次出现了真正发挥作用的共产主义政党。最坚定的共和派，英国的平等派，法国的巴贝夫派，等等，是最先提出这些‘社会问题’的人。”我们本国的实用主义者们遮蔽了这种富有特色的辩证趋向，特别是在苏格兰。但马克思却不会忘记，他曾从亚当·弗古森的《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中获益良多。这本书在《资本论》中被当做历史哲学的独创之作多次引用。

马克思所描绘的目标，也就是本书所向往的。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充满着艰难险阻。1970年和1971年，在英国和北爱尔兰的工业中，斗争水平的高涨迫使反动势力的捍卫者在通向自由的道路上竖起新的障碍。但是，工人斗争的浪潮势不可挡。英国工人通过史无前例的不经工会批准的罢工，捍卫了自己的生活水准。而摇摆不定的“左翼”领袖，却远远落在工人的后面。

武装到牙齿的英军没能摧毁北爱尔兰起义的精神。1916年爱尔兰起义的领袖詹姆士·坎诺利现在备受人们敬仰，如今他的追随者比他生前还多。1916年起义对列宁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现在，爱尔兰大地上到处回响着要求建立联合工人共和国的呼声。而马克思和列宁的名字则更频繁地被人们提起。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人类未来的思想，它引导我们远远地超过了目前的改良主义政党的目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在群众的自我运动中寻求实现。本书作者以巴黎公社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的深刻内涵。

关于巴黎公社的那一章是任何一个读者都不应漏过的，其中有某种震撼人心的东西。但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简单提一下。这一章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这种自我保卫的行动同时也是自我管理的行动。”此种警句值得牢记在心。

欧洲革命的失败以及斯大林主义在俄国的兴起，造成了巨大的历史倒退。但这个倒退正在被克服。现在，革命的进程掌握在新一代的

手上。像笔者这样的属于上一代的革命者，应该对新一代年轻的革命者抱以赞赏与希望。人类的未来就操在他们的手中。

本书以其理论研究对目前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它再次举起了理论的旗帜，同时不忘工人阶级的斗争是一切理论的真正源泉。我们衷心地希望，本书的发表能开启一代新风，让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再度振兴，以对抗那些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出版物。最近，英国首相对我们说，我们都依赖于利润的生产。他或许永远都不会看到本书，但是，当创造利润的工人们把本书阐释的原理付诸实践的时候，他会感受到本书的力量。我们感激杜娜叶夫斯卡娅写作了这部出色的著作，并对普路托出版社为出版本书英国版所做的努力谨致谢忱。

哈瑞·麦山

赫伯特·马尔库塞写的序言

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理解当代状况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恐怕没有任何理论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对晚工业社会的各种趋势作出了如此精确的预见,同时却从其分析中得出了如此错误的结论。虽然,二十世纪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表现出许许多多马克思曾经根据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预见过的特征,但是,这些矛盾并没有在一场总危机中爆发。尽管存在着“永久的战争经济”,或许正是由于这种战争经济,所谓的“帝国主义时代”经历了洲际大改组,同时也达到了西方世界的洲际稳定化。而且,尽管社会主义革命一直在酝酿着,并在一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概念指导下不断萌发,但随后在共产主义轨道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却几乎没有表现出任何实质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东西。然而,要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仅仅指出马克思的“预言”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是丝毫没有意义的。如果仅仅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成熟资本主义发展的观点,他们在谁都没想到要“证实”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就对这个过渡作出了阐述,那么人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未来有所预言。但是,这种理论的本性是否定这一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对历史的解释,是在这种解释的基础上对某种政治行动的定义,这种政治行动可以利用一定的历史可能性,建立起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苦难、没有不公正的社会。因此,不论是在概念结构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必须对历史现实的过程作出“反应”。对理论概念和在这些理论概念指导下的政治实践的修正,是理论本身的一部分。

然而,如果修正只是在新的、未曾预见的事实的影响下,对原有概念进行补充,以便使它保持正确,那么理论结构本身就被破坏了。只有当修正是从原始概念中引申出来的,是其中内在固有的历史替代物时,理论的结构才能保持。修正与理论基础之间必须有可以指明的关联。理论基础是关于工业社会的辩证唯物主义概念。它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各个不同层次统一起来。最普遍的哲学范畴和最具体的经济学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行动,都必须由它来加以论证。

关于马克思理论的讨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多半都没能正确地阐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和内容,因此陷入一片混乱。辩证唯物主义被简单化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物理支撑”,或者形式化为一种技术方法,甚至规范为一种世界观,结果把问题搅得一团糟。当然,也有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例如,乔治·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以及最近法国的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考查。热·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清除了这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她试图在马克思理论的最深刻的基础上重新把握马克思理论的统一体,这个基础就是它的人道主义哲学。

人们经常强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前的那些哲学作品,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准备了基础。经过了长时间的被忘却、被忽视之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作品成了二十年代思想界注目的焦点,特别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首次发表之后。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阶段”与其政治阶段和经济阶段之间的同一性并没有得到阐释。也许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因为还缺少一个决定性的环节,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这部遗稿是在1939年和1941年发表的。杜娜叶夫斯卡娅的著作超过了以前的那些解释。它不仅指出了马克思的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之中贯穿着哲学,而且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从一开始就是政治学说和经济学说。马克思的理论是在它所阐释的历史辩证法的影响之下产

生和发展的。它的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状况的理解。它的“观念”来自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哲学洞察：这个社会阻碍了自由和理性的实现，同时又为一种自由合理的人类存在状态创造了前提条件。由于“自由”这个词被严重地滥用，以致我们几乎无法使用这个术语，我们不妨换一种说法：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为一种没有苦役、没有贫困、没有不公正、没有焦虑的人类生存状态创造了前提条件。

马克思对这样一个目标的“价值”没有提出疑问。他接受人道主义，不是把它作为各种哲学中的一种，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一种历史可能性。通过变革阻碍实现“全面的个人”的现存社会条件，可以建立起实现“全面的个人”的新的社会条件。马克思接受人道社会（社会主义）的“价值”，并把它作为思想和行动的标准，就像人们接受健康的价值，并把它作为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标准一样。马克思的理论不是在描述和分析“自在自为”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以另一个社会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即以一种已成为行动的现实目标的历史可能性为参照来描述和分析。作为一种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始终是双向度的：它以现存社会自身的各种客观历史可能性和潜能，来测度这个社会。这种双向度性表现在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的统一之中：马克思的哲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每一个经济范畴同时就是哲学范畴。杜娜叶夫斯卡娅对《资本论》的讨论，很好地展示了这种统一。它向我们展示出，对生产与流通的最技术性的分析，是与人道主义哲学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批判与人道主义哲学的联系一样紧密。

一旦我们把人道主义观念不仅看做马克思理论的根源和目的，而且看做它的实质，马克思理论中根深蒂固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要素就显露出来了。社会主义不是在劳动的解放和劳动的组织中实现，而是在劳动的“扬弃”中实现。只要人与自然的斗争还要求通过艰苦劳动来生产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情境下所能实现的，就只能是对劳动的充分合理的社会组织。在高度工业化的阶段上，建立这种合理的组织“仅